

知识分子的启蒙形态与当代使命

彭文刚

摘要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声称与真理相关联而以“启蒙者”的角色存在。自近代以来,他们有意地推动了社会的启蒙与进步,但同时这种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却违背了“有蒙共启”的根本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改革中都充当着“启蒙者”的神圣角色,但市场经济导致的世俗化进程却使之被边缘化。正视自身的有限性,接受大众的批判,以理性的心态重新定位并深化自我启蒙的进程,或许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启蒙 自我启蒙 使命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2)03-0134-07

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成为解读中国启蒙的经典范式,而该学说暗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态的隐忧与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救亡的政治使命使之未能完成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的启蒙理想,而后者则正是现代性的根本前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都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优先地位。特别是在启蒙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并以启大众之蒙为使命确证着自身的存在价值。但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就是人类灵魂的导师,真理的唯一拥有者,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使命是自封还是社会赋予?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知识分子毋庸置疑的“启蒙者”地位遭遇了挑战。如何在当今现实的社会结构中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使之真正体现启蒙的理性精神,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而对此问题的思考,则可能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真正自我启蒙的起点。

一、新型知识分子及当代中国的启蒙

启蒙哲学家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用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在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启蒙:不需他人的引导而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正是在独立使用自己理性取得成功之处,知识分子又陷入新的蒙昧之中:对权力的迷恋、对理性的无批判信任。因此当代的知识分子显然应当实现第二次启蒙:自身的启蒙、自我治疗。罗蒂将这种自我启蒙了的新型知识分子描述为“反讽主义者”,“反讽主义者乃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反讽主义者”与启蒙以来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是,“反讽主义者认为,人的道德性、人类的道德主体性,就在于人是‘有可能遭受侮辱的东西’。她的人类团结感建立在对人类共有的危险的

感受上,而不是基于一种共通的人性或共享的力量。”^[2]也就是说对人类现实的苦难、受奴役的可能性而非抽象的形上实体如“共通人性”、“普遍法则”等的关注,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区别于启蒙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启蒙知识分子试图以理性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则当代的知识分子则总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伯林语),他们真诚地面对人类经验的可靠性、人类存在的多样性。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知识分子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黑格尔之后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则更加自觉地抵制着形而上学的诱惑,避免陷入“客观主义”,同时也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当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对现实的人而非抽象人性的关怀中,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团结并实现着自身的“启蒙”。认识到这一点,对思考中国当代的启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知识分子证明自身权威的理论依据。但显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却表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关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现代性的进展。在邓晓芒看来,中国的两次启蒙之所以都不成功,在很大意义上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理性的缺失以及将政治作为自己的思考中心。“但遗憾的是,不论哪个时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而不像卢梭和康德那样一些隐居起来思索人性问题的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所以他们都把衡量理论的绝对标准置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可行性之中,……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充满了过激心态及对政治权力的诉求,而缺乏宽容精神。……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中的急躁心态,即自以为把握到一点真理就立即要把它付诸实践,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3]或者按照李泽厚的分析,中国的启蒙之所以陷入僵局,原因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即知识分子“救亡”的政治逻辑压倒

了“启蒙”的文化逻辑,从而使自由、个性这些现代性的价值在中国被边缘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使中国知识分子以全球性的视野来真实地思考中国自己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从而也真正去除了自我加附的政治幻相。知识分子以一种独立的人格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任务,真实地推动了中国的新启蒙进程。“在 90 年代后期,知识界再次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被称之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大型论争,这是知识界另一次意义重大的对公共性的参与。从两次论争的问题、视域与水平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正在经历着从怀抱天下型的‘普遍知识分子’到务实专微型的‘特殊知识分子’的方式的转换。它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们正在摆脱学术/政治、专业/公共等这些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模式,尝试以一种更加成熟的、知识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政治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建设。”^[4]而这正体现着启蒙的原初含义: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而这里的理性不仅是理论理性更是实践理性,康德指出在实践理性领域每个人都是“立法王国的一员”,因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是启蒙的主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不断地在抛开“专业权威”的历程中证明了自身的坚韧,并取得了自己的话语权。知识分子更应当抛弃自己浪漫主义的“为天地立心”的政治渴望,作为社会的一员以平等心态接受来自“民间”的启蒙,接受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实现“有蒙共启”,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远不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因为启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话语。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在近代欧洲的思想史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西方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将为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及其启蒙事业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启蒙：一桩未竟的事业

启蒙按其本意即“照亮”，西方的启蒙运动作为近代以来决定西方命运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启蒙理性最为典型地体现为改造自然的“科学”及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主”，这也就是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先进性最为直观的理解，即“赛先生”与“德先生”。可以说正是理性最高地位的确立，使西方社会开始真正走向现代。事实上，理性权威得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在自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便是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既然这些答案已经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我们没有理由不能把他们运用于政治、伦理、美学这些更加复杂的领域。”^[5]尽管人可以为自然、道德、历史立法，但这里的“人”却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仅指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精英、领袖等）。

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不仅引领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而且制造了启蒙的话语逻辑并取得了关于真理的话语霸权。“知识就是力量”绝不仅仅是启蒙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使知识分子看到了理性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也理所当然地相信理性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具有的解放功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他们因掌握关于世界的真理从而以“立法者”的角色存在。这不仅因为知识分子（狭义的知识分子即科学家）能把握自然界的规律，而且因为知识分子（广义的知识分子）能获悉社会与整个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在启蒙视域中，尽管人的本质是理性得到了重新强调，但理性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却不是均等的，而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知识分

子因切中了事物的本质而拥有与“实在”相符合的“理论”。于是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就成为衡量社会其他成员信念或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

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不仅肩负着将宇宙、人类存在的隐秘本质揭示出来的道德责任，而且承担“站在高处”判断人之行为、政治决策之合理性并启蒙大众的政治使命。但作为立法者与启蒙者，他的对象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国家成员的每一个人，而是立法者与之具有同等自由的共同体的成员。而受制于生存必然性的、“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阿伦特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显然并不在启蒙对象之列，这进一步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英主义特征。“启蒙被理解为有条理的、理性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建立在广博知识基础之上的判断能力的提高，而‘群众’的固有缺陷是启蒙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统治者需要被启蒙，臣民需要受训练以成为有纪律的人。”^[6]也就是说，群众、大众因缺乏理性而并不处于启蒙的对象之列，他们永远都是没有差异、“沉默”、“无言”的大多数，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他们唯一的角色就是作为可以无限塑造的“质料”接受来自启蒙了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赋予的各种“形式”。即使康德也将妇女排除于启蒙对象之外。实际上，启蒙运动尽管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旗号，殊不知启蒙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有产者的利益代言人。他们的启蒙世界观不过是一种以普遍姿态出现而实际上代表特殊阶层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方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曾经以“立法者”、“启蒙者”自居而在社会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如今却只能是以经营某种特殊的知识为生的普通大众。因为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拒斥了任何唯一性的“真理”，每个人都成为拥有平等地位的社会公民，任何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的做法均被视为非法。知识分子只好调整了策略，塑造其自己的社会角色——阐释者。由于现代社会分化为一个由诸多共同体组成的多元社会，而每一共同体显

然有着自身特殊的话语形式与知识系统。“交往”成为后形而上学时代最为重要的一个难题，于是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这项使命：促进各个独立自主共同体成员之间真诚的交往，将一种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解释”为被另一个参与交往的其他共同体成员所理解的形式。尽管现代知识分子自觉地缩小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曾经辉煌的角色——立法者。实际上，居于每一个共同体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据有一种优势的心理，怀有一种能制定规则并充当裁判的梦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进步永远需要启蒙。知识分子如果要真正担当启蒙的角色，则必须赋予启蒙更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反观和回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无疑任重而道远。

三、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

在启蒙世界观中，“知识就是力量”不仅是知识分子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重要口号，而且也是知识分子真诚地履行道德、政治使命的根据。实际上，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具体的观点有何不同，但在总体上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信念：存在着唯一的普遍的宇宙模式和客观力量；作为人的理性之重要体现的知识能够准确把握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知识的功能就是要理解这些力量，而普通人的责任就是要从知识的角度来调整自己以适应于这一不可避免的历程。”^[7]因而总体上来说，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取得重大成就之时，也因理性的独断与自负而陷入启蒙的幻相之中。

首先，知识分子认为启蒙就是用理性战胜传统，用知识取代迷信。理性代表着真理、光明、解放，而传统社会之所以黑暗、人们之所以无知，主要是权威而不是将知识作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近代以来的启蒙世界观，其盲目的乐观主义把理性等同于真理，把传统、权威等同于愚昧、落后，于是

传统、权威成为一文不值甚至有害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摒弃。但事实上这是理性主义的一个幻相。“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权威信仰和使用自己理性之间的对立，本身是合理的。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性源泉的可能性。”^[8]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急切地试图切断与传统的关系，并在理性的基础上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奠基。殊不知，理性并非传统的对立面，至少从历史上看，理性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或者说理性“嵌于”传统之中。20 世纪的解释学、社群主义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但这经常被理性主义逻辑所忽略。正是立足于传统，理性才能实现自身的辩证超越。

第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坚信普遍规律说，相信“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自由终将实现。无论是“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还是“人为历史立法”，“法”、“规律”是整个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真正的知识就是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其责任就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告诉大众：规律即是如此，你应当这么做，否则将受到命运的惩罚。知识分子表面上是证明了人的理性的超自然特质，维护人类的尊严，但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推卸责任。“它主要源于一种推卸责任的欲望，在我们自己不被评判、特别是不被强迫去评判别人的情况下停止评判的欲望；源于逃到某种巨大的、与道德无关的、非人的、磐石般的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艰难时事’或结构的不可抗拒的演进——的欲望。”^[9]以此看来，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洞察了普遍的、不得不如此的规律，从而告知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但如果规避人的选择与自由意志，那么知识分子指引规律的职能便失去应有的意义，因为康德已经深刻地指出道德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而所谓“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过这种表征着的自由丧失了实质的内涵。

第三,知识分子热衷于规划,沉迷于计划。知识分子的哲学王式的政治理想使政治成为一项可以操作的技术,这极大地误解了政治的本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了沉思与行动之间的区别,沉思作为哲学的范畴与行动作为政治的范畴虽然都是自由的体现,但显然二者具有极不相同的含义。但自近代以来,政治领域被抽象为知识系统,典型体现是科层制,而政治也蜕变成科学的理论教条。知识分子作为启蒙了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做事情就是解决问题,……在这种活动中,理性主义者声称他自己拥有工程师的性格,他的心灵被恰当的技术彻底控制住了,他第一步就是把一切不直接与他的特别意图有关的东西从他的注意力中排除。实际上,这种将政治同化为工程可称为理性主义政治的神话。”^[10]将政治与技术(知识)等同,不仅打破了它们的边界,忘记了它们各有其法则,而且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用知识(哲学)来改造政治,用真理来取代意见,致使哲学与政治都“走火入魔”(施特劳斯特语)。知识分子更是热衷于理性的乌托邦计划而难以自拔。而在 20 世纪,“计划”、“规划”成为集权主义的代名词,以致哈耶克认为任何计划都是“自命的自负”并且是“通往奴役之路”。

总之,知识分子在反对传统、确立理性的唯一合法地位的同时,矫枉过正以致使知识在反对神话的进程中重新成为神话和权威。由此知识分子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并宣布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通过理性的计划改造人们的政治生活,在世界上建立起人间天国。于是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成为立法者与真理的拥有者,而普通大众则成为他们根据规律而实施其宏伟计划的可以无限加以塑造的质料。但显然知识分子的这种“我启你蒙”的逻辑却违背了启蒙的主旨:大胆使用自己的理性,走出精神上的未成年状态。因为它又一次使人成为不能自觉使用自己理性的未成年人。启蒙的根本精神是“有蒙共启”,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既是

启蒙的主体又是启蒙的对象,但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这样一种自我启蒙的勇气与意识,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首先是未启蒙之人。当启蒙世界观在 20 世纪遭遇挑战时,知识分子不仅处境尴尬,而且要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寻找理论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丧失,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正是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真正明确自己使命的开始。

四、深化自我启蒙 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作为知识传播者、教育者、立法者的角色推动了启蒙现代性的建构,但随着现代性遭遇危机,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分子失去了立法者的优越性。如何回应这种变化,调整自己的角色,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前提,这也决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尊严。显然当作为第一哲学的实体形而上学已不合时宜而遭到拒斥后,形而上学的超越、批判维度却作为合理性的因素得以保存。当知识分子失去了与形上实体的联系之后,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合法地宣称自己是普遍真理的掌握者。那么知识分子首先就要清理自己的形而上学信念及其政治理想。

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知识分子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分化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而在存在论意义上,没有哪个共同体更接近于“实在”。所以“这些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他们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关联。”^[11]如果“实在”、“本质”只是一个“唯名论”的概念,并没有真实的所指,那么所谓的与“实在”相符的真理便只是一个幻相。因而知识分子应该放弃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逻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再是像哲学王那样提供

普遍的真理,相反他们应当自觉地进行自我的批判性反思,亦即自觉地对自身进行启蒙。在对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理论思维无条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因而自我批判、自我启蒙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首先,以“自知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谦逊态度来思考知识、政治的本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而是真诚地做一个真理的追求者、热爱者、探索者,并自觉地意识到知识的限度。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如果承认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所谓的真理不过是有用的知识。它并不与“实在”相关,因为所谓“实在”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同时知识分子应该放弃“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卸下并不适合自己的精英主义政治担当,以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哲人身份出现:爱智慧而并不自诩拥有关于理念的绝对知识;积极参与政治而并不声称对何为理想的生活拥有终极的解释权。人之有限性、社会政治生活的经验性特征,决定了任何人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历史的,而这正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牛虻”而得以存在的合理根据。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当富有一种“怀疑主义”的品质,宽容、开放的心态及对他人负责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具有一种鲜明的“边界意识”。

其次,知识分子应对现代性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保持警惕。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使人在价值领域陷入“诸神之战”,从而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宗教对人的精神教化作用。随着超验领域的进一步萎缩,导致了“怎么都行”的价值虚无主义后果。“因为没有宗教,情感的狂热与某种经验的实用理性相结合,便排开现代的科学理性,而走向‘癫狂’。”^[12]但实际上并没有纯然的事实,一切事实都是被价值所中介过的;同时价值也不是仅仅停留于形式的“应当”,它要求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在此意义上,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经营知识之时,更应当提升自己的美德,不应以道德是私人的事情而拒斥德

性。尽管知识与道德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但“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统一性诉求,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自觉努力的目标。

最后,知识分子应当以批判为根本志业。知识分子在文艺复兴时代成功地批判了神话、迷信从而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体现了启蒙的内在精神。但我们的时代却仍然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启蒙了的时代。因为当代资本虽然在摧毁等级制、实现个人自由与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资本又异化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并与权力合谋共同实现着对人的有效统治。因此思考如何消除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后果,破除各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成为当代启蒙的重要内涵。“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3]于是“知识就是权力”在现代性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含义:知识不是关于永恒真理的普遍知识,权力也不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政治特权,毋宁是“知识就是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与权力保持距离,不成为权力的附庸,而成为权力的监督者。知识分子的梦想不仅在于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教授,相反,他应当成为“批判者”,他参与政治并不为获得某种权力,而是要使政治领域听到多种声音,从而保证社会的完善、多样性与团结。

实际上,深化自我启蒙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市民社会”融为一体,则中国的知识分子则需要放弃所谓的“尊严”,与全体人民一道实现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可从中重新发现社会,放下身段,接受来自民间的启蒙与反启蒙。”^[14]总之,如果说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后蒙者自居而以后蒙大众为目标,显然当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便是自我启蒙,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成年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超越情怀及自由意识的理性主义者。人存在的有限性、非完美性决

定了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注定要参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自身的不断蜕变中推动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与完善，相信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自身的不断启蒙中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将推动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当然也要看到中西启蒙的内在区别，如果说西方是过于理性化，而在中国则是理性的缺失。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开阔的理论视野，但更需要将理性客观化的实践智慧。“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在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制，就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因之，多元、渐进、理性、法制，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具体发扬，这就是我所启蒙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15]或许李泽厚的忠言仍然是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启蒙及知识分子使命的重要标杆。

注释：

[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22 页。

[2]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30 页。

[3] 邓晓芒：《20 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史学月刊》，2007 年第 9 期。

[4]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第 90 页。

[5]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年，第 29 页。

[6]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新与知识份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6 页。

[7] 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38 页。

[8]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360 页。

[9]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 183~184 页。

[10] 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5 页。

[11]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14~15 页。

[12][15] 李泽厚：《启蒙的走向》，《华文文学》，2010 年第 5 期。

[13]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25 页。

[14] 彭晓芸：《知识分子须放下身段接受民间启蒙》，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0224/17054019.html>

作者简介 彭文刚，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程平）